

古埃及神庙中的“秘传”知识

颜海英

(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北京 100871)

摘要:“秘传知识”是上古世界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是知识等级制度的产物,古埃及人称之为“神秘知识”,希腊哲学家称之为“隐微教诲”(与“显白教诲”相对应)。追溯秘传知识的传统,有两个线索:一个是古埃及人自己对神秘知识的记载,通常是间接地提及;另外一个则是后世对秘传知识传统的演绎,如希罗多德记载的埃及神秘仪式等,这种演绎一直延续到中世纪时期甚至更晚。“秘传”知识的研究需结合这两种文献,从秘传知识的内容以及流传过程中后世的诠释两个角度进行解读。

关键词:古埃及;秘传知识;神庙;阿拜多斯神表;《努特之书》;《法雍之书》

中图分类号:K411.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21)01-0029-08 **DOI:**10.19925/j.cnki.issn.1674-2338.2021.01.004

希腊罗马统治埃及时,少数埃及知识精英开始将传统的“秘传知识”系统而集中地以文本、图像、建筑等种种形式表达出来,成为赫尔墨斯主义的发端和后世赫尔墨斯文献的原型。此后,埃及的智慧之神图特与希腊的智慧之神赫尔墨斯融合称为赫尔墨斯主义的核心。上古晚期,随着基督教合法化,赫尔墨斯主义和诺斯替主义等被边缘化的古代思潮成为“异端”,但它们保存着古代文明的内核,在西方文化史上始终绵延不绝地以各种面目出现。其“秘传”的出身和“异端”的身份使其形成独特的、晦涩的表达形式。在现代社会的,这些东方思想的精华渐渐不为人知。[1]

对古埃及神秘知识的研究中,有两种观点较具代表性。一种认为神秘知识反映了古埃及社会等级制度造成的知识分配不均的现象,是少数人掌握特殊权力的体现。如约翰·贝因斯认为:“知识根本上来说是实现权力的手段,是古埃及社会化过程的组成部分,是统治者的控制方式,

其基本的前提是没有人了解所有的事情。”[2](PP.1-23)另一种观点则强调“神秘知识”是古埃及知识精英对神圣宇宙秩序的认识,是神圣世界与世俗世界之间的界限,在后期埃及成为祭司阶层的文化身份象征,最终成为欧洲思想史上关于古埃及的文化记忆。[3](PP.9-25)本文将结合古埃及人自己对神秘知识的记载与后世对其所做的评注和演绎,从秘传知识的实践和流传过程对其实质进行解读。

古埃及语中表达“神秘知识”的词语很多,可分为三组:第一组词意思多为“隐蔽的”,含有神秘的意思,如 hbs, hAp, kAp;第二组是 sStA, 它是个使动结构,词根是 StA, 意为“神秘的、难以接近的、晦涩的”;第三组词是 jmn, 意为“隐藏的”。[4](P.10)

古埃及的神秘知识有着悠久的传统,古王国时期就有一种叫作“掌管秘密者”(Hry-sStA)的头衔,多为高级官员或祭司。从词源上讲,“掌管

收稿日期:2020-11-1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古埃及神庙典籍与仪式研究”(19BSS011)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颜海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埃及学研究。

秘密者”的写法就是墓地守护神豺狼头的阿努比斯的形象,暗示着神秘知识的核心是和死亡相关的。古王国第六王朝的官员卡努姆就曾有“黑暗之秘密的保有者(Hrj-sStA nj kkw)”的称号。中王国时期,第十二王朝的一位州长,埃尔-巴尔沙(el-Barsha)的杰胡提霍特普(Djehutihotpe)也有类似的头衔:“神之言辞的秘密之保有者,……每一个(神圣)官职的掌控者”,“图特之家中看到一[]之秘密的保有者”,“仪式之秘密的保有者”。[2](P.9)第十三王朝,奈菲尔霍特普(Nefert-hotep)铭文中曾记载国王能够发现和阅读官员们不能解释的文献,这样的记述正与“秘密的保有者”这一头衔相吻合,都指明了宗教仪式知识的分隔和书写知识的限制性。

中王国时期拥有这个头衔的大臣伊赫诺弗里特(Ikhnofret)在阿拜多斯的纪念碑中,提到自己掌握秘而不宣的神秘知识,其内容之一是象形文字的秘密,第二部分是工艺诀窍,第三部分是艺术风格的秘密。新王国时期的《亡灵书》里多次提到国王通晓一种别人都不知道的神秘文字,那种文字是东方神灵所说的话语。[2](PP.1-23)在民间传说中,这些秘传知识被称为《图特之书》,共42卷。古代晚期作家中,不止一位作家提到过它,如普鲁塔克、著名的基督教学者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Clement of Alexandria)和亚历山大的西里尔(Cyril of Alexandria)等。后世的各种神秘思潮如赫尔墨斯主义、诺斯替主义等,都与古埃及的神秘知识有着渊源关系。[5](P.21)

在古埃及的文化传统中,神秘知识是专属于国王和极少数知识精英的,对普通人而言则是禁区。托勒密时期的世俗体文学作品《塞特纳·哈姆瓦斯故事 I》用主人公的传奇经历讲述了这个道理。故事的主角哈姆瓦斯王子原型为历史上新王国国王拉美西斯二世的第四个儿子,孟菲斯普塔神庙祭司。他对魔法特别好奇,到处寻找传说中的魔法书——《图特之书》,最终在王子纳奈弗尔卡普塔墓中找到了它。纳奈弗尔卡普塔之妻阿赫瓦尔的鬼魂向他讲述了丈夫因为魔法书而遭到神遣、家破人亡的故事。哈姆瓦斯王子不听劝阻,执意拿走魔法书,并当众宣读,再次触怒神,被神引诱杀死自己的儿子。哈姆瓦斯将魔法书还回纳奈弗尔卡普塔墓中灾难才结束。[6](PP.128-129)据说魔法书最初被藏在一个湖的中心,湖中心有一个铁盒,铁盒里边有铜盒,里

边又有木盒,一层一层包裹,最后有个金盒子,里边装的是魔法书,这周围还有蛇蝎毒虫环绕以保护它。魔法书打开之后,会震动天地山河,诵读者能听懂飞鸟、水中游鱼以及走兽的语言,能看到天空中的九神。[6](P.146)

一、从阿拜多斯神表到泰布图尼斯祭司手册

在阿拜多斯的第十八王朝国王塞提神庙中,有两个神殿中刻写着孟菲斯“诸神列表”,其原型是古王国时期的神表,这是秘传知识的一个重要线索。塞提神庙的建造,是第十九王朝开国君王恢复文化传统的重要举措。第十九王朝面临着埃赫纳吞宗教改革留下的集体创伤,埃赫纳吞主张独尊太阳神阿吞,并破坏阿蒙神庙等纪念物,对传统的多神信仰体系造成巨大的冲击。当塞提一世在阿拜多斯建造集神庙及奥赛里斯墓于一体的建筑时,将古老的仪式、神话等以文字、图像和建筑本身等多种形式表达出来,使得这个神庙成为一个承载文化记忆的纪念碑。



图1 阿拜多斯神表①

在索克尔和尼弗尔太姆神殿中的“诸神列表”有63列,但保存状况不好;在索克尔神殿的有51列,保存相对完整。除了拼写特点之外,列表中的一些名字也与古王国时期的一致,学者们基本确定该列表有古老的原型。列表的内容是古代孟菲斯的神学地理:

15-23 栏:西方;东方;普塔在东方的作坊;西方的标志。

24-25 栏:塞塔伊特的庄园。

26 栏:赫努姆船之厅。

27-30 栏:塞塔伊特之门。

①图片出自 John Baines, *High Culture and Experience in Ancient Egypt*, Sheffield:Equinox Publishing Ltd, 2013, p. 168.

31-33 栏:赫努姆庄园。

34-36 栏:南厅。

37-51 栏:北厅;孟菲斯南边;孟菲斯北边;尼弗尔太姆神庙。[7](PP.125-129)

1-12 栏描述了普塔神各方面的特质。15-17 栏有关于创世及创造人类的神话内容。33、41、51 栏提及“南方角落的荷鲁斯”“石头上的塞赫麦特”等仪式地点。根据 Kees 的考证,3-8 栏的内容在两个古王国时期的大臣墓中也有出现,一个是尼乌瑟拉的大臣普塔赛普赛斯墓(Ptahshepses)中的假门,现存大英博物馆;一个是约 100 年后太提的大臣萨布(Sabu)墓中的假门,现存开罗博物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大臣都是“普塔-索克尔”神的大祭司,他们都有几个鲜为人知的祭司头衔,其中阿拜多斯列表上的六个名字在两个大臣的假门上以三对的形式出现,其中两对与阿拜多斯列表上的顺序一致,分别是:

第一组:普塔-索克尔在所有地方的祭司, hnty-tmnt 祭司,诵读祭司(CS 3-4 栏);

第二组:辣木树下的神的祭司, hnty-mdf 祭司(CS 6-7 栏);

第三组:旗杆最前方者,伟大的先驱者祭司(CS 8, 5 栏)。[7](PP.125-129)

这种描述神学地理的列表,目前发现的例子中很少有古王国时期的,除了这两个大臣的假门之外,最相似的是第五王朝吉萨一个大臣墓中出土的写字板,上面有第二到第五王朝的王名、神名、庄园名。[7](PP.125-129)

虽然神学地理列表很少见,但列表式样的其他辞书类文字早在第三王朝乔塞尔金字塔神庙中就有;第四王朝斯尼弗鲁金字塔河谷神庙中以这种形式表现各地庄园的供奉;第五王朝尼乌瑟拉太阳神庙中的四季堂浮雕以图文并茂的列表辞书表现再生循环的主题。贝恩斯认为,早期文字在以列表形式记录经济活动的同时,也以同样形式书写神圣文献,如神庙中的诸神列表,金字塔铭文中的神名、地名等,但后者受限于知识等级制度,只有国王和少数贵族可以使用,因此也有少数贵族以此炫耀其身份地位,这就是为何在上述贵族墓假门以及写字板上会出现诸神列表。[7](PP.125-129)

从诸神列表在阿拜多斯神庙中的位置及环境来看,其作用可能是作为仪式的引导。该神庙浮雕的铭文中有很多对话,像某种宗教戏剧,神

表是系列仪式中的一个环节。关于阿拜多斯奥赛里斯秘仪的记载非常有限,其中两个在自传中描述奥塞里斯秘仪的官员都是阿拜多斯奥赛里斯神庙的大祭司,其中伊赫诺弗里特生活在第十二王朝塞索斯特利斯三世(Sesostris III)时期,奈布瓦威生活在第十八王朝图特摩斯三世时期。塞索斯特利斯三世在阿拜多斯建造了奥赛里斯神庙以及纪念奥赛里斯的假墓,图特摩斯三世墓中发现了最完整的《来世之书》。这些都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对核心宗教文献进行整理和保存的时代留下的印记。[5](P.29)

托勒密时期的希腊作家克莱蒙特记载了古埃及神庙祭司所需要掌握的基本知识,他提及这些知识集中在 42 本书中,分为 6 类,神庙中不同种类的神职人员要掌握不同的专业知识,不仅要牢记于心,还必须能够熟练地运用。其中第三类神职人员是神庙书吏,他们要掌握 10 本圣书体书籍,“必须熟知圣书体文字,知晓宇宙学和地理学、日月的位置,还有五颗行星;还有对埃及的绘图,和尼罗河的地图;祭司用具和他们的神圣之地的描述,还有神圣仪式的步骤与使用物品”;第四类神庙人员是圣衣者(stolist),他们也要掌握 10 本书,所涉及的内容包括“给予众神的荣誉,埃及人的祭祀事务;有关供奉、初熟之物、赞美诗、祈祷文、游行、节日等等,以及教育和献祭之事”。[8](P.160)

这些描述与诸神列表在古王国到新王国时期高级祭司群体中的使用是一致的。而罗马时期的泰布图尼斯神庙图书馆中系统收藏了克莱蒙特所描述的“祭司知识”。其中发现的用于培训祭司的手册共有三份,一个是圣书体象形文字的,两个是僧侣体的,学者们通常称它们为“塔尼斯地理纸草”,其内容分为 10 个部分:

第 1 部分:天与地,时间与空间的划分;

第 2 部分:39 个诺姆的列表(罗马时期的划分)及习惯信息;

第 3-4 部分:圣物及其祭司相关信息的附录;

第 5 部分:更古老的三个诺姆的名称,下埃及 18-20 诺姆;

第 6 部分:圣物及其相关信息的附录;

第 7-8 部分:神庙日历;

第 9-10 部分:社会等级。[8](P.150)

祭司手册的多份抄本,也说明了以神庙为编撰中心的宗教知识手册的扩散和应用。在泰布

图尼斯图书馆发现的仪式文献中,6份是开口仪式用的,6份是供奉仪式用的,3份日常仪式用的。其中开口仪式的手册是首次发现的、在神庙而非葬仪中使用的僧侣体手册。日常仪式用的手册与第十九王朝阿拜多斯塞提神庙及公元前10世纪底比斯发现的纸草抄本的内容一致。[8](P.150)

二、《努特之书》

在阿拜多斯塞提神庙后面的奥赛里翁(即奥赛里斯之墓)石棺墓室的天花板上,雕刻着《努特之书》,图像与铭文都已经残缺不全。这个铭文最特别之处在于,在千年之后的泰布图尼斯图书馆出土了对它进行评注的纸草,这份纸草上还有对公元前2000年阿苏特(Asyut)的铭文的临摹。奥赛里翁是个墓葬结构的建筑,建成后就封闭起来,其中墓室天花板上的《努特之书》,古时候人们应该是看不到的。同样的《努特之书》还出现在底比斯西岸帝王谷的拉美西斯四世墓室天花板上,说明在当时是有纸草版蓝本的。而千年后的纸草上出现对它的复制和评注,说明这正是祭司内部流传的高级知识。

塞提神庙奥赛里翁的《努特之书》雕刻在墓室天花板西半部分的最右边,努特的身躯呈拱形,头在右边,脚在左边,身躯下面是空气神“舒”张开双臂托举着努特。女神的嘴边有个带翼的日轮,旁边的榜题是“西方地平线”。女神的胯间写着“东方地平线”,脚面上是一个日轮。而这个日轮前方不远处又是一个小一些的日轮。从小日轮开始,有一条水平方向的波浪线。女神膝盖前方是一个圣甲虫;膝盖后方、腿外侧是秃鹫女神奈赫拜特。女神身躯下方竖行的文字分别是日月星辰等的名称。[9](P.1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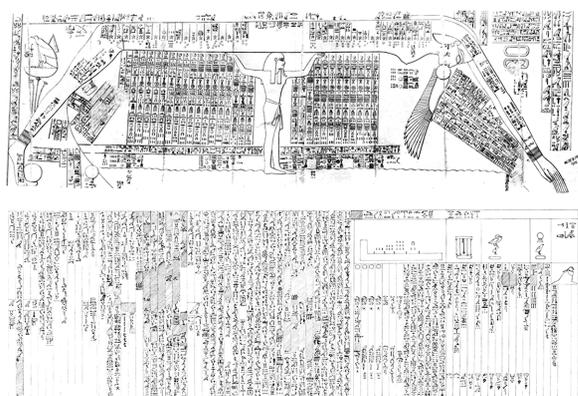


图2 《努特之书》①

卡斯伯格纸草有两份抄本,都保存在哥本哈根大学博物馆。其中卡斯伯格纸草I约68厘米长,30.5厘米高,开头极可能有塞提神庙《努特之书》的绘图,但这部分及第一栏开头部分的文字都没保存下来。卡斯伯格纸草Ia约25厘米长,虽然内容与I相似,但并非它的复制品。[10](PP.36-38)

卡斯伯格纸草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对于塞提神庙《努特之书》的评注,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每个部分先描述位置,然后解释画面的含义。

A 是对整个画面的总括介绍;

B 提及太阳神从东南方向升起;

C 描述太阳神从杜阿特(黑暗的冥界)向上升起,并且提到了确切的时间——“第9个小时”。这也是第一次有文字材料说明古埃及人认为太阳与群星的起落是相关联的,它们都消失在杜阿特,又从中再次出现。

D 描述世界的边界,世界的外围环绕着一望无际的黑暗水域,太阳也无法到达,日月星辰及大地都在这个黑暗水域的环绕之内。

E 解释太阳和群星的运行规律。旬星“出生”后在东边天空活动80天,之后在中部天空“工作”120天,然后在西部天空“居上”(tpy)90天,最后在 dwAt 停留70天(无法在夜空中看见)。每个夜晚可以看见29颗旬星在夜空中“活动和工作”,7颗在 dwAt 中无法看见。[10](PP.36-88)

F 以神话叙述的方式描绘太阳运行,日落时太阳进入努特之口,得坎群星尾随进入。当太阳从努特子宫出现时,恢复到她最初的年轻样貌。此处再次描绘世界边界,西部边界即女神的头部外侧,有两个椭圆形的“冷水之巢”,那里栖居着长着人头、讲人类语言的群鸟。[10](PP.38-42)

卡斯伯格纸草的第二部分非常特别,它是极少数保存下来的戏剧题材的文献。虽然这部分纸草残缺不全(可能是它所依据的蓝本本身就残缺),但主要情节还可以看到。它以戏剧对话的形式描述群星的运行,把它们进入努特之口描述为努特不断吞吃自己的孩子,而地神盖伯为此一直与努特争吵。每个夜晚有7个旬星是看不见的,只能看到29颗。旬星进入杜阿特之后,在那里停留70天,它们在那里就像黑暗之湖的鱼,它们的眼泪也变成了鱼。最终在盖伯的命令下它

①图片出自 H. Frankfort, *The cenotaph of Seti I at Abydos Plates*, London: The Egypt Exploration Society, 1934, Pl. LXXXI.

们脱离了杜阿特,重返天空。旬星会在天空消失70天又重现,正如月亮也会在消失28天之后重新出现。卡斯伯格纸草的作者在总结这些规律的同时,提及旬星、月亮都与太阳相关联,正是这种关联使得它们消失又再现。[10](PP.67-80)

自拉美西斯四世开始,国王墓室的天花板开始以成对的天空女神努特的浮雕装饰,即两个努特的形象背对背构成对称的两个部分,与阿拜多斯的一样,画面不仅表现太阳的行程,也有旬星等其他天体的轨迹。第二十六王朝的 Mutirdis 墓中,也有极其相似的《努特之书》。其后出现在墓室或者棺椁上的《努特之书》多数不完整。

三、《法雍之书》

《法雍之书》现存的多数版本都发现于罗马时期的法雍,它们是在泰布图尼斯神庙的一个窖藏中发现的。最初的版本可能是写在纸草上的,有大量的插图,现在保存比较好的三个部分分别是本利希(Beinlich)纸草、布拉格纸草(Blag)、阿姆赫斯特(Amherst)纸草,这几份纸草上的文字都是圣书体文字。本利希认为最初完整的《法雍之书》应该有10米长,为了方便使用,它最开始就是分别写在两片纸草上的。[11](P.183)

在科翁伯神庙的墙上,雕刻着《法雍之书》部分内容,没有任何插图,整个浮雕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供奉天牛的内容,另一部分是一些较短的段落。两部分出自同一个粉本。科翁伯是法雍之外的第二大鳄鱼神的崇拜中心。最重要的是《法雍之书》也出现在其他地方,而且是铭刻在神庙中。

此外,还有若干僧侣体的版本,大部分残缺严重,只有一份保存相对完好,有圣书体版本的六分之五的内容。[11](P.184)

法雍是开罗西南的一片低洼地,通过巴赫约瑟夫河与尼罗河谷相连。该河注入法雍湖,现在湖区有233平方公里,古代时面积更大。自公元前2000年开始的几次垦荒工程,为了获得农田,将注入湖中的支流切断,使得湖水大幅缩减。该地有大量鳄鱼,因此鳄鱼神索贝克是当地的主神。在《法雍之书》中,太阳神在夜间是以鳄鱼的形象游向他第二天升起之处。而死神奥赛里斯则是法雍湖中之水,随着尼罗河泛滥而来,象征着繁殖,蕴含着太阳神每日复新的潜力。

《法雍之书》的地理描绘是从巴赫约瑟夫河开始,向北展开表现法雍湖区,然后聚焦在三个城市:

东南的塞迪特(Shedyet)、北边的巴赫亚斯(Bacchias)、西南的奈特神的阿卡西亚(Acacia)。图文穿插在一起,把法雍的地理特征、宗教中心及神话中的存在交织着,这是按照古埃及人心目中最重要的地方构建的嵌套的神圣景观。古埃及人在各种层面上模仿和建构宇宙,小到房屋、宫殿,大到神庙、诺姆乃至整个国家。[12](PP.68-69)

《法雍之书》的开头是一对象征山丘的符号,围绕着7条横向的画带,延伸约1米长。中间的画带是空白的,上下三条画带由内到外依次描绘的是鱼类、鸟类、树木。再向外侧,则是一系列神祇的形象,旁边的铭文写着他们所在的地方。第二部分是巨大的女神迈赫特乌瑞特(Mehetweret)的形象,从她的臂肘蔓延出两条曲折的运河,代表法雍南北两条注入湖水的运河,运河是托勒密时期修建的,因此该文献的年代应该是托勒密时期或者之后的时期。第三部分是拉神的形象,他的身体一半浸没在水中,然后是两个载着鳄鱼神索贝克的船,上下相对,呈镜像状态。这三个部分表现的是法雍湖的景观。接下来是一个长长的椭圆形地带,表现的是法雍地区的陆地,如前边的画面一样,在两侧有神祇形象及描述其所在地的铭文。之后是一系列鳄鱼神的形象,最后的画面是一个岛屿,上面有奈斯女神的祠堂、创世八神的祠堂以及鳄鱼神的祠堂。全书的结尾是一个巨大的王名圈,里面的文字内容是“法雍是拉神、奥赛里斯、荷鲁斯和法老的领地”。鳄鱼神祠堂的外观是古老的样式,由三个表示庄园的符号hwt组成,两侧各有一个旗杆,这是塞迪特神庙的象征,因此此处又将人们的视线引回法雍主城。[11](PP.188-1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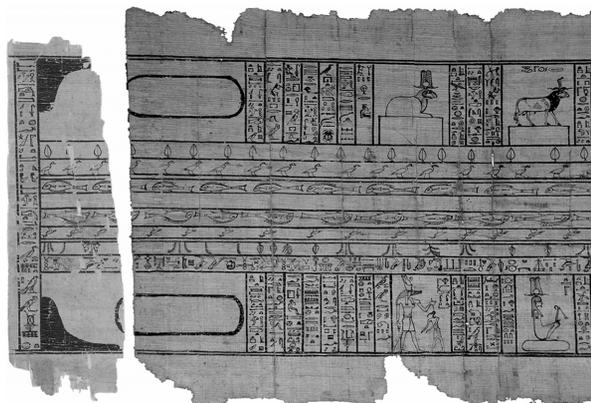


图3 《法雍之书》开头①

①图片出自 John Baines, *High Culture and Experience in Ancient Egypt*, p.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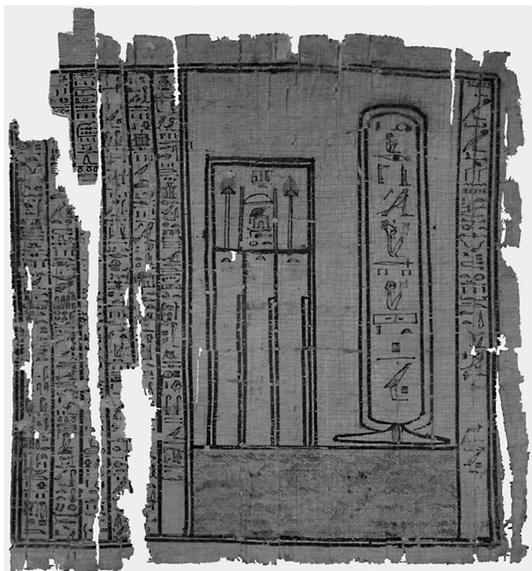


图4 《法雍之书》结尾^①

泰特认为,从内容看,《法雍之书》与辞书是同一种类型的,只不过辞书没有插图。二者的基本逻辑和结构是一致的,只不过《法雍之书》近一半的内容是图表,又以地图的形式结合了地貌背景。[11](PP.188-195)笔者认为,从其表现形式看,《法雍之书》最接近新王国时期帝王谷的《冥世之书》系列,是创造性地以传统的体裁表现托勒密时期法雍地区宗教地位的尝试。

《法雍之书》的创作者和使用者无疑是祭司群体。大部分版本都是在神庙的窖藏中发现的,是一批被弃用的文献中的一部分。此外,现存主要版本是圣书体,这是只有祭司阶层才能掌握的高级知识,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更是这样。

《法雍之书》如何使用,在学界一直有争议。圣书体的版本极其复杂,插图出自不同画匠的手笔。有的文字方向是颠倒的,从阅读的角度看极其不方便。作为地图式的资料,查阅也非常困难。长达10米的卷轴,如果展开阅读,相对小的画面还可以,但较大的画面,如表现法雍陆地的部分,是不可能一个人就可以持卷打开、尽收眼底的。有的学者认为这种文献是仪式用的,在特定仪式中悬挂在神庙中,大部分时候是收藏在神庙圣所的。也有的学者认为这是祭司训练用的,除了几个主要版本,还有僧侣体的抄本,这些都没有图像,其内容类似神庙仪式中的祷文,可能是祭司日常使用的。其中一个僧侣体抄本的最后有这样一段话:

“这份文献由帕-盖伯(Pa-geb)完成,他是为贝亨(Bekhen)之主索贝克-拉神的第一预言师写

的,他也是泰布图尼斯和盖伯之主索贝克神的第一预言师,众神的王子。他的名字是拉-索贝克,他也是在贝特努(Betenu)主持仪式的瓦布祭司。哈德良在位第二十年,泛滥季第一个月,第八天。”[11](P.201)

从目前发现的多种抄本来看,很可能当时一些神庙高级祭司想有自己的一份《法雍之书》。而这个作品从文字到艺术的精湛程度足以使它成为祭司训练的模式。

最值得注意的是刻写在科翁伯神庙墙上的《法雍之书》,铭文分为两个部分,中间有分界线,其中一半的内容是奉献给天牛的,另一半是其他段落的汇集。这个版本没有任何图像,只有铭文部分。[11](P.183)而现存的圣书体纸草版本共有三个部分,分别收藏在三个博物馆,其中最长的两个很可能最初就是故意写在两个纸草卷上的,《法雍之书》总长10米多,在膝盖上展开一个纸草卷的极限长度应该是5米左右。科翁伯是法雍之外的第二大鳄鱼神崇拜中心,《法雍之书》在此出现绝非偶然。根据这种分为两部分的结构,以及相关正字法的研究,科翁伯神庙墙上的《法雍之书》所依据的模式应该是泰布图尼斯的纸草版。因此,《法雍之书》在作为祭司训练用的范本之外,还是使用该类文献装饰神庙及其他相关场所的模式。

四、神庙图书馆与“秘传”知识体系

第四王朝开始,古埃及神庙就有收藏管理文献和典籍的机构,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考古发现的神庙图书馆遗址极少,主要有第十九王朝拉美西斯二世祭庙,古罗马时期的纳戈·马第图书馆、塔布图尼斯图书馆、底比斯图书馆等。其中的文献分为管理类和典籍类,前者主要是经济文书等管理档案,后者包括宗教祭仪、天文、文学等经典。这些经典既是知识库,也是高级文化的呈现,秉承着古老的传统,在收集、选择的基础上编订而成,其主要作用是为祭司、司法和医学活动提供知识储备,规范日常生活和品行的基本准则,体现社会精英的文化身份。与亚历山大图书馆这类国家图书馆不同的是,神庙图书馆的基本原则是保存经典和遵循

^①图片出自 John Baines, *High Culture and Experience in Ancient Egypt*, p.127。

知识等级制度,其中的“生命之屋”就是整理、保存经典的核心机构,也就是前文提及的神秘知识的产生和传承之地。

发现于20世纪30年代的古罗马埃及时期的大型图书馆——泰布图尼斯图书馆,目前已发现2500份纸草文献,由哥本哈根大学凯茨伯格纸草国际学术委员会主持整理,阿克塞尔·维尔滕(Aksel Volten)和吉塞佩·伯蒂(Giuseppe Botti)两位学者对这批文献进行了将近30年的整理工作,完成了分类、编目和部分识读。瑞霍尔特则将泰布图尼斯神庙图书馆所存的叙述体文献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其专著《来自泰布图尼斯神庙图书馆的叙述类文学》(Narrative Literature from the Tebtunis Temple Library)有对这些作品的完整转写、翻译和注释,并剖析了文本保存、故事背景、人物与历史事实的关联性等问题。[8](P.142)

与其他神庙图书馆相比,泰布图尼斯是图书保存最多的图书馆。虽然艾德福神庙“生命之屋”的墙上留下了此处曾经的藏书目录,但文献没有保存下来。此外,泰布图尼斯的藏书风格相对保守,迪米(dime)图书馆的很多藏书是世俗体的,奥克西林库斯图书馆甚至有很多藏书是译成希腊文的,目的是保证发音的正确。而泰布图尼斯的藏书多数是僧侣体的,而且它们要么早于其他地方的图书,要么依据了更古老的版本。

泰布图尼斯神庙图书馆绝大多数纸草文献的成文年代约为公元1至2世纪的古罗马埃及时期,少量为公元前1世纪和公元3世纪。纸草文献按内容分为三类:宗教仪式110篇(50%)、科学文献60篇(25%)和叙事文学60篇(25%)。

宗教仪式类文献又细分为五类:祭司知识手册、仪式手册、宗教赞美诗、魔法文献和祭司教育文献。其中祭司知识手册是祭仪类文献中最重要的一个子类,其中有六部作品尤其重要,已发现的这六部作品的手稿数量约有50多份,将近祭仪类文献手稿总数的一半。[8](P.148)

(一)《神庙之书》(*The Book of the Temple*),约有50多个手册抄本;

(二)《图特之书》(*The Book of Thoth*),约10篇文献,为“爱学习之人(mr-rx)”与智慧之神的对话;

(三)《法雍之书》(*The Book of Fayum*),约有8至10篇,以鳄鱼神索贝崇拜中心法雍为原型的神话地理;

(四)《努特之书》(*The Book of Nut*),5篇僧

侣体纸草文献,描述来世的神话地理;

(五)神话手册(*the Mythological Manual*),4份僧侣体手稿,叙述埃及各地的神话传统;

(六)祭司手册(*the Priestly Manual*),3份手稿,其中一份为圣书体,另外两份为僧侣体。即“塔尼斯地理纸草”,包括天文地理、地方区划、神圣知识、神庙历法以及礼仪制度等十个方面的内容。[8](P.149)

祭司教育文献是神庙祭司接受训练的主要内容,包括圣书体文字的语法和词汇,以及词典和词汇表。其中以僧侣体写的专有名词词典长达10米多,其前半部为按主题排列的动词和名词组成的古埃及语“词典”,后半部分为祭司知识手册和日历。[8](P.151)教育文献还包括古王国时期的国王敕令、中王国墓葬铭文的抄本,应该是祭司们学习写作的范本。[8](PP.151-152)

如果把前文考察的三种文献传统——祭司手册、《努特之书》和《法雍之书》放在泰布图尼斯神庙图书馆收藏的整体背景中,可以看出这些作品都有悠久的流传过程,而且在泰布图尼斯以外有多种抄本,既是王室专用的墓葬文献,也是官员彰显社会地位的标签。它们作为经典和秘传知识的传承脉络,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以各种形式出现。

从古埃及秘传知识的内容和流传过程看,宗教经典和仪式指南是并重的,掌握经典是基础,但更关键的是通过对仪式的参与,在宗教实践中体悟经典的真谛,这是学习的两个阶段。古埃及人用两个不同的动词表达这两个阶段的学习:rekh和sia。rekh是指掌握技术和现实层面的知识,即语言和文字交流中所必须使用的概念;sia则是一种绝对的直觉或者综合的知识,不能归于合乎逻辑的知识。具备完整的sia的只有创世主,其他的神则或多或少具备一些,对于人类而言,rekh和sia之间的距离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开放的空间,让他们不断地探寻,但是人永远无法进入神的境界。[13](PP.166-167)

如前所述,古埃及语中表达“神秘”的词中,最常用的是sStA,其词根的意思是“困难的”,在世俗文学中这个词也是这个意思,特别是在数学纸草中,用这个词来表示“难懂的”“艰深的”。这个基本含义与上述的第二阶段的感悟式学习sia所强调的是一致的:真理的最高境界是“知行合一”。

贝恩斯以知识等级解释神秘知识的形成及其在社会礼制中的作用;阿斯曼等人强调神秘知识与古

埃及人宇宙观的联系。他们都没有充分强调古埃及高级文化传承中“知”与“行”的统一。这种高级文化不是自然演变的结果,而是统治手段的核心部分,通过节日庆典、贵族自传、墓葬文学等辐射到整个社会,特别是自中王国时期开始,到后期埃及发展到极致的来世信仰的大众化,使得核心文化日渐普及。但作为一种以生命哲学为核心的综合性知识,唯有少数社会精英在神庙的特定仪式环境中,以特定的生活方式,得以浸濡其中,克服认知的障碍,进入感悟(sia)的境界。

对神庙典籍的内容及源流的考察证明,在祭司教育中各个门类的知识之外,作为仪式指南的祭司手册有着指导实践的重要作用。而神庙典籍中的核心文献,如作为仪式引导的诸神列表和辞书字典,作为神庙及墓葬装饰蓝本的《努特之书》《法雍之书》,在后世被评注、传抄,并出现在多种纪念性建筑之中,更证明这类知识的实践性。所谓神秘知识,其门槛不仅是对内容的掌握,更表现在实践中体悟的资质和能力。即使对于体验到这种知识的祭司来说,也不会是一劳永逸的,他们需要一次次重新建立连接。而关于普通人不可僭越神秘知识限制的提法,多数出现在大众文学中,因为不可企及而增加了神秘色彩。

参考文献:

- [1] 颜海英:《古埃及神秘哲学的现代启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7月19日。
[2] Baines, J., “Restricted knowledge, hierarchy, and decorum:

modern perceptions and ancient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Research Center in Egypt*, 27, 1990.

- [3] Assmann, J., “Der Tempel derägyptischen Spätzeit als Kanonisierung kultureller Identität”, in E. Iversen, J. Osing, and E. K. Nielsen eds., *The Heritage of Ancient Egypt: Studies In Honour of Erik Iversen*, Copenhagen: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1992.
[4] Assmann, J., *Sonnenhymnen in thebanischen Gräbern (Theben I)*, Mainz: Philipp von Zabern, 1983.
[5] 颜海英:《神圣时空下的文化记忆:〈冥世之书〉与奥塞里斯秘仪》,《外国问题研究》,2020年第3期。
[6] Lichtheim, M., *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 A Book of Readings III: The Late Perio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7] Baines, J., “An Abydos list of Gods and an old kingdom use of the texts”, in J. Baines and T. G. H. James eds., *Pyramid Studies and Other Essays Presented to I. E. S. Edwards*, London: Egypt Exploration Society, 1988.
[8] Ryholt, K., “On the Contents and Nature of the Tebtunis Temple Library: A Status Report”, in S. Lippert and M. Schentuleit eds., *Tebtunis und Soknopaiu Nesos, Leben imrömerzeitlichen Fajum, Akten des Internationalen Symposions*, vol 11,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5.
[9] Quirk, S., *Exploring Religion in Ancient Egypt*, Hoboken: Wiley Blackwell, 2015.
[10] Neugebauer, O., R. A. Parker, *Ancient Egyptian Astronomical Texts, Vol I*, London: Brown University Press, 1969.
[11] Tait, J., “The ‘Book of Fayum’: Mystery in a Known Landscape”, in D. O’Connor and S. Quirek eds., *Mysterious Lands*, London: UCL Press, 2003.
[12] O’Connor, D., “From Topography to Cosmos: Ancient Egypt’s Multiple Maps”, in R. J. A. Talbert ed., *Ancient Perspectives: Maps and their Place in Mesopotamia, Egypt, Greece and Rom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13] Wente, E. F., “Mysticism in Pharaonic Egypt?”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41(3), 1982.

“Esoteric Knowledge” in Ancient Egyptian Temples

YAN Hai-yi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Esoteric knowledge” is a common cultural phenomenon in the ancient world, which is the product of knowledge hierarchy. Ancient Egyptians called it “mysterious knowledge”, while Greek philosophers “subtle instruction” (corresponding to “explicit instruction”). There are two clues to trace the tradition of esoteric knowledge: one is the ancient Egyptians’ own records of mystical knowledge with an indirect reference; the other is the later generations’ deduction of the tradition of esoteric knowledge, such as the Egyptian mystical rituals recorded by Herodotus, which continued to the middle ages or even later. The study on “esoteric knowledge” should involve these two kinds of literature, and interpret it from two aspects: the content of esoteric knowledge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later gener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spreading.

Key words: ancient Egypt; esoteric knowledge; temple; Abydos Divine List; *The Book of Nut*; *The Book of Fayum*